

财新图书
Caijin book
series

亚洲的未来

走出消费式增长的“繁荣”怪圈

[马] 钱德兰·奈尔◎著 徐尧 李哲民◎译 杨百揆◎译校
(Chandran Nair)

CONSUMPTIONOMICS

Asia's Role
in Reshaping Capitalism and
Saving the Planet

西方消费型增长模式是否真有助于亚洲的发展？

变革的亚洲，如何定位自身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财新图书
Caixin book
series

CONSUMPTIONOMICS

Asia's Role
in Reshaping Capitalism and
Saving the Planet

亚洲的未来

走出消费式增长的“繁荣”怪圈

[马] 钱德兰·奈尔◎著 徐尧 李哲民◎译 杨百揆◎译校
(Chandran Nair)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的未来: 走出消费式增长的“繁荣”怪圈 / (马) 奈尔著; 徐尧, 李哲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4

书名原文: Consumptionomics: Asia's Role in Reshaping Capitalism and Saving the Planet

ISBN 978-7-5086-2999-5

I. 亚… II. ①奈… ②徐… ③李… III. 消费经济学—研究—亚洲 IV. F130.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3517 号

Consumptionomics: Asia's Role in Reshaping Capitalism and Saving the Planet by Chandran Nair

Copyright © 2011 by Chandran Nai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right of Chandran Nai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亚洲的未来——走出消费式增长的“繁荣”怪圈

YAZHOU DE WEILAI

著 者: [马] 钱德兰·奈尔

译 者: 徐 尧 李哲民

译 校: 杨百揆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1-554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2999-5/F · 243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自 250 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极大地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外貌，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元，人类是这场变革的最佳见证。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读懂了这个事实，鲜有人能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尤其是在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领域。过去几年间，世界经济波折不断，二次衰退及主权债务危机的威胁都充分印证了人类思考的缺失。

然而，此次金融危机正试图掩饰一场更大的社会危机。本书及时地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不断减少的资源消费方式，对经济与社会健康的衡量方式，东西方正在改变的力量均势以及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等问题。简而言之，未来人类社会将处在一个脆弱的世界中，人类应该深思自身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本书以一种更好的方式为人们指出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

如今，一直以来为西方推崇的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所暴露的裂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然而，许多主要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仍然把“一切照旧”视为解决西方经济困局的良方，并希望借由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来完成。他们期待这个超过 40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能积极地刺激

消费，进而促进亚洲乃至全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

同时，本书明确指出，各国政界领导人若坚持盲从不计一切代价求增长的经济模式，亚洲乃至世界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为此，书中大致描述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现状，要求亚洲各国政府先各自为营，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来行动，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最迅速、最合理的贡献，而其中关键的一步，在于要能通过一揽子政治举措及建立新的奖惩制度来抑制过度消费。

这并非激进的言论，但即便是欧洲最具前瞻性的评论家、记者以及气候变化倡导者，都感觉到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如同一片难以下咽的苦药，因为这与他们心中对于个人消费权利的信仰背道而驰。同时，它还对这项权利的赋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即对于物质和服务消费而言，其产品并不能反映社会或环境所付出的真正代价。

对于亚洲而言，其目标是要通过理解重新引导消费质量的必要性来实现可持续性，对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可持续性都是个很抽象的概念。而且，它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对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而另一方面，为了能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长期过程中同时满足当下及未来的需求，我们又要追求可持续性，要更尊重环境，更好地对待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把这两者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目前在国际上仍然频繁使用。我个人则更倾向于罗伯·格雷在一段采访中所说的“要把地球当做我们所生活的家一般对待”。但此刻，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这么去做。

1992年到2006年期间，我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幸与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会面，他们对环境问题及国内外各大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见解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在环境问题上他们比绝大多数西方国

家都更有见地)。我庆幸自己能够目睹中国领导层对这些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他们为此所作出的努力,不仅是有限的行动,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能从不同角度去思考环境,同时能够认识到“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对实现全民小康的必要性,将其作为高于一切的目标,在兼顾远近的同时消除贫富分化。

然而,我们所有人都被一种叫做“观念硬化症”(观念僵化)的疾病困扰。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学习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更为困难,尤其是当问题源自传统观念时。

我对钱德勒·奈尔的勇气表示赞赏,他大胆地道出了问题所在,并敢于挑战资本主义的现状。作为他的首部著作,本书平静而温和地写下并传递了一个简单而大胆的信息:亚洲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模式。该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框架,它要求对资源利用作出限制,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真正价值,并恢复中国传统的平衡之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使市场力量能够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所用。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能更先迈出这一步。

要采取行动,需要有胆识过人的政治领导层。采取新行动的失败风险会远远大于继续采用现行政策的失败风险。我们必须——如果需要的话——通过各自为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的方式来改写资本主义的规则,而不是等待什么国际共识。

克里斯宾·蒂克尔



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经济转型中，成功地让超过 3 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堪称历史上最为重大而空前的政府成就之一。

对于一个如此庞大却不富裕的国家而言，转型固然需要牺牲和取舍，然而，许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些牺牲和取舍让中国在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及社会冲击方面都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在 2010 年 12 月 23 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次转型成本之高，只有后几代人才能了解其真正代价。同时他还说道：“(这样的) 增长模式如今几乎耗尽了所有潜能。”

温家宝总理在 2011 年初与中国网民的一次在线交流中同样提到：“我们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摊子，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摆在眼前，所有这些担忧和关注将意味着中国乃至世界都必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20 世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成就正是 21 世纪各种危机的始作俑者，隐约可见的气候变化灾难、大范围

的环境破坏、严重枯竭的自然资源，穷苦大众的未来一片暗淡。根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贫困的标准估算，中国有 1.28 亿人还处在贫困水平；若以国际上通行的人均每天收入不足 1.25 美元的标准估算，则多达 4 亿人左右。

我们必须质疑对西方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盲从。试想，若亚洲数十亿人都试图追崇西方，试图打造以消费为主导的生活方式，那将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恰恰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现在被引导的需求。

对目前的发展方向进行重新评估是非常必要的。但矛盾的是，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亚洲可以说是能够挑战现行模式的最佳对象，基于同样的原因，表面上延续现行模式也最有发展前景，但这里面实际上埋下了毁灭的种子。显而易见，延续现行模式的道路行不通。

欧洲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美国经济也出现连续不断的不良状况，尽管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西方世界仍然对个人消费权利抱着极其坚定的信念。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及商业利益相关方全然不顾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竟妄图通过移植这种失败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给亚洲来拯救世界经济。对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效胶囊”，亚洲各政商界领导人必须坚决抵制。他们正好可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接过世界领袖的衣钵，严正拒绝眼下这种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式。

西方资本主义教条所强调的市场、技术和金融并不能让中国实现“和谐社会”。中国领导人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政治抉择。是应该容许西方式的自由，容许对生态环境和负社会外部性的低估，还是应该进行干预来保证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

尽管艰难，但必须作出决定，诉诸已被粉饰的“绿色”方法只会延误时机。指望单靠技术便能解决所有问题并造就“双赢”是行不通的，而这却正

是“一切照旧”拥护者所呐喊的口号。如何能处理好新规则的制定和推行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消费习惯？对于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商界领导人应认真对待。

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特性使其备受瞩目，许多人正观望着中国，想知道它将如何应对挑战。我认为，中国现在应当发挥其全球领导力，号召世界与其共同努力，停止忽视以消费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资源及环境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中国可通过承认目前不计一切代价的增长方式与对极限的科学认知背道而驰的事实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这种不合理的增长方式必须由严格的资源管理及消费规则所替代。

最近，中国涌现出了不少反对腐败政府官员的民间环保力量及民间运动。中国政府应认真对待这种现象，以恰当的举措回应。21 世纪的中国，“和谐社会”的基础必须从资源的获取着手，这样才有公民对不同基本形式的消费的权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之核心任务，是改写资本主义的规则。其中，要把资源管理置于所有政策制定的中心，同时要对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外部性评定真实代价。这需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即要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消费加以限制，同时要有政策来保证这些限制的实现。

在本书中，我论证了政府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应当遵循的几点核心原则：

1. 资源是有限的：经济活动必须要有利于保证资源的多样性；
2. 资源必须能为当下和将来所公平利用：集体福利必须高于个人权利；
3. 必须重新评定资源价值，对生产力的追求应集中在资源而非劳动力上，例如，以更少的资源及更多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若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以上几点，中国便能够实现全新的资源定价机制，创造出更实际的消费环境，商品和服务也将能体现出资源的真实价值。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具备实现的条件。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或许能够应对我所认为的 21 世纪最为紧迫的挑战。中国有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缔造一个更可持续及公平的集体发展模式，引领民众走向理智消费的同时，还能为其提供全面的保障体系。

要达成这些目标绝非易事，但让我备受鼓舞的是，推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意愿已开始具象化。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及再生资源领域正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对太阳能应用及海水淡化所作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富足的生活。其真正想表达的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实行约束制度来实现各自的期望，而亚洲国家应当作出表率。

毫无疑问，围绕一个以限制、约束和制约为框架的经济政策谈未来，必然会招致争论甚至嘲讽，但亚洲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必须迈出这一步。中国，是能应对这严峻现实的理想国度，是能通过新途径改善世界状况的开端。



从现在到 2050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从 67 亿上升到 90 亿，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①

——托马斯·弗里德曼

大约 20 年前，我发现自己在各种企业和论坛作演讲时会越来越多地提到环境问题。它与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大家反复讨论的话题。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日渐被一个问题所吸引——如果亚洲继续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结果到底会怎样？尤其是对于如此广大而又特殊的地区而言，如果每个国家都把消费驱动型社会当成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对此非常着迷。

我常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生怕自己会被指责不具备发言权。但随着演讲机会的增多，我对自己许多尚不成熟的想法进行的检验也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接受我的想法的。

① 托马斯·弗里德曼，《竞赛开始》，《纽约时报》，2009 年 12 月 9 日；可参阅：<http://www.nytimes.com/2009/12/20/opinion/20friedman.html>。

我发现有一部分听众，特别是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他们似乎对我所提出的认为目前的发展轨迹不具可持续性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也有一些听众会表现出广泛接受的态度，尽管有更多支持性的评论是在会后私下提出来的。

我感到很好奇。到底是哪些位高权重的人士可以决定哪些话题可以接受，哪些观点可以表达？我还能表达更多意见吗？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论坛的召开，我表达观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些论坛所讨论的许多议题都是我所熟悉的，因为我在相关领域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实践研究，做过首席执行官，做过环境咨询师，管理的项目遍布亚洲——从中国和印度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

为了不冒犯别人，我竭尽所能做到礼貌和谦卑，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无端地指责为消极悲观分子。对此我实在难以接受，因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有一次在瑞典的一个论坛上，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对我说，我其实是个煽动者。尽管这只是友好的调侃，但我能察觉出，虽然他同意我大部分的话，就像很多联合国官员一样，可他还是担心我可能已经触碰到一些潜协议。因为我所抛出的挑战，让包括企业领袖、政治家、学者等在内的听众都始料未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区域经济峰会上，我的言论使我显然被归为了“环境学家”一派。我谈到了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的问题，对投资增长造就繁荣、环境也会受到繁荣回馈这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很多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我是杞人忧天；环境不会变得像我所说的那么不堪，因为在那之前，企业便会承担起责任。

15 年过去了，香港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与它的邻居广东成了一对难兄

难弟，会议的议题也变得更加宽泛——从探讨如何与环境更好地相处，到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然而，2008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复。尽管与会人员大多为自由群体，但我对于美国人应当重视全球变暖问题并应该采取行动的提议，却并未得到广泛接受。显然，即便只是传播消费可控的言论——例如建议将车辆拥有量限制为每个家庭一部、引进碳关税，或者哪怕只是少吃点儿——都等于干涉了美国内政。

尽管如此，随着气候变化逐渐进入各国的政治议程，逐渐成为主流议题，我发现自己的言论遭到的直接抵触变少了。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隆，同时越来越多的论坛也为许多鼓舞人心的演讲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向听众宣传生态居民的责任，让他们“改变自己”。领导力依旧，但只有在它注意到有新的社会网络能够动员民众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取代了技术革新，消费者变得更道德，而企业被强烈要求减少环境足迹，因为“逐绿”意味着省钱——同时还有益于世界，有益于消费者，有益于它们自己和它们的股东。

不管怎么样，至少问题正逐渐得到重视。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地——有点儿太慢了——开始改变。2009年7月，我在巴厘岛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的对象是一家全球老字号私人财富银行的客户。演讲中我重点谈到了消费导向型增长给亚洲带来的难题。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让我颇感意外，有些人甚至对我只是随口而说的话表示接受，例如“珠光宝气已过时”、“少就是多”以及要限制消费等。听众当中有一位全球领先的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本来期待能与他单独共进晚餐，但听完他的一些建议后，我觉得应该先把自己的演讲延伸一下并写下来。你们现在读到的正是我们谈话的成果。

既不东，也不西

各位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本书的结构。该书的核心部分是讨论作为一股经济力量而重新崛起的亚洲，及其给自身和世界造成的困境。但在我与一些朋友分享了一些暂定的纲要之后，他们常常提醒我，要确保我所说的话不会被视为反西方言论而遭到攻击或排挤。

坦白说，这种告诫让我感到困扰。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赞同我去传播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提醒我警惕那些世俗精英们的反应呢？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难道真有那么危险吗？要知道，中国和印度有不少主要的国际性刊物，几乎每天都会在其社评专栏刊登相关评论文章，而批评其他亚洲国家运作的文章同样随处可见。

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澄清一下，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攻击西方。它既不是说西方如何让事情变糟，也不是说亚洲怎么能让情况变好。当然更不是为了宣扬什么“亚洲时代”的来临，西方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其中不乏亚洲人，都纷纷加入到这种言论阵营当中。在我看来，这些言论的观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这本书确实有某种攻击性，我想大多是针对亚洲目前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做法对亚洲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各国领导者们对待自然的决策上依然缺乏反思。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欢迎一些新规则的。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缺乏责任感。在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人都批评政府，指责它们未能通过实际行动兑现那些辞藻华丽的诺言，不论是提供发展援助、改善气候变化，还是进行全球化的军事行动。许多这样那样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尽管后果可能没那么快到来。但西方国家该如何去做，并不是我要讨论的中心。相反，亚洲社

会必须做什么，最关键的是亚洲政府必须做什么，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亚洲必须作出改变，同时我也越来越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亚洲企业的领导者几乎从来不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治理倒退等问题提出任何看法。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公认的世界顶尖大学和商学院中接受过教育，为什么他们要选择保持缄默？难道他们真的是忙到连稍微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还是说，他们真的觉得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真的觉得什么代价都只是短期的，繁荣最终还是会逐步实现的？

于是我开始猜测，他们也许只是太害怕而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后，不知道他们的企业或商业伙伴会如何看待自己。我尝试着逐渐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常常去听他们的“绿色演讲”。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尽管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实力，他们还是会害怕面对理直气壮的理性，但在私下除外。我怀疑，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保持沉默的原因只是不愿意越线。不管有什么矛盾，这个体制毕竟还是给他们带来过不少福音。拿供应链管理来说，它能帮助企业以便捷的方式将一些有害的外部因素（例如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哈佛商学院模式的供应链管理，在国际上极具专业认可度，作为多国委员会的亚洲代表，如果能把自己提升至这种专业水平，那将会得到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这么说来，质疑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注意到许多世界级的精英商学院（绝大多数在美国），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方式去塑造亚洲学生的思维。在我看来，这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并没能在这些学校里学到那些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更富有责任心，能够为自己祖国所遇到的问题出一份力的实用技能，学校更多的只是传授意识形态。

在这些学校的教学当中，丝毫没有提及人们应该如何在对地球施以限制和约束下进行管理和创新。相反，这些学生被教导的是，依靠自由市场的帮

助，消费驱动型经济已经成为实现繁荣的最佳手段。政府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但主要是充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扫清障碍的角色。而民主的加入更是为其锦上添花，西方世界不仅成功地推进了文明进程，达到了幸福和科学成就的新高度，同时还——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观察到的——来到了历史的终点。

一般来说，这样的自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跌跟头。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人们对它竟然还保持着相当的自信，这着实让我感到诧异。我在一所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学生大多数来自亚洲，也有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极少数人会对作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基础的种种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即使在今天，尽管他们的祖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会贬低自己的出身，并把自己的远大抱负选定为进入投资银行或跨国企业。他们其实很聪明，非常聪明，但在心智上却很不成熟。

管治

沉默和否认，这两者毫不相干却又交织在一起。在思索这两者可能存在的关联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困扰着我：可持续性意味着公平、公正和节制，为什么我们对于可持续生活方式必要性的认知，没能赶上我们科技革新的步伐呢？

综观整个 20 世纪，人类通过各种非凡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对自然与日俱增的掌控力。然而，我们失败的地方，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在于我们对创新发明的管治能力。我们的发明总能快人一步，但我们对其影响的监管能力却极其滞后。最为典型的是，我们总是等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才会有所作

为，就像人们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一样。我们还没有找到能使技术和金融创新，与制定相应的限制和规则同步进行的方法，而这些苛刻的限制和规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的不断演进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麻烦。今时今日，亚洲有超过 22 亿的人能用上移动电话——远比他们能用上洁净饮用水和厕所的机会还要高得多。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技术和基本需求可获得性之间的差距，还得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在曼谷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些朋友住在湄南河岸边，他们家里都买了电视和录像机，平时他们把湄南河当成下水道，把生活污水都倒进河里，但同时他们也用这些被污染了的河水清洗物品，甚至洗澡。此后，连住在贫民窟的穷人甚至都能用上手机，但他们还是一如往常地往河里倾倒垃圾和废弃物。在亚洲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类似的景象，例如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但令我不解的是，在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都已经是白菜价的年代，为什么厕所反倒成了奢侈品？为什么那些头脑极为出众的才俊宁愿帮企业制造更多的电子玩物、帮银行不停地修改资产负债表，也不愿为塑造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管治方针出一份力？在书中，我探究了这些问题的缘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由经济体系决定的，而经济体系又是由一个绝大部分为西方机构的“精英”集体决定的，要想得到激励和嘉奖，必须要创造更多符合和满足这个集团所需要的增长。

新价值观

为了更好地提出建议，我试着回顾了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提到也不认为，亚洲的政府或文化要比其他地方